

后来的事

夏目漱石著



后来的事



后 来 的 事

〔日〕夏目漱石 著

吴 树 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目漱石
それから

本书根据 1979 年 8 月中央公论社
《日本の文学》(13)译出

后来的事

〔日〕夏目漱石 著

吴树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插页 1 字数 178,000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91,000 册

书号: 10188·478 定价: (六)0.88 元

序 言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作家。从种种意义来说,长篇小说《后来的事》(似可意译为《未了情》)都被认为是他的中期代表作。有的文学史家则根据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深度,将这部作品看作夏目漱石的前期创作与后期创作的分界线。

《后来的事》写于一九〇九年,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侥幸胜利之后不久的时期。日本通过这次战争,跻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但是日本的经济底力贫弱,而国势的急剧膨胀乃是在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前提下取得的,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激烈生存竞争及普遍的“生活难”在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就是在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这部作品,与另一部长篇小说《三四郎》(一九〇八年)及继这部作品之后写成的《门》(一九一〇年)是夏目漱石的中期三部曲。但这是就这三部作品的某种内在联系而言的,

而在故事情节及人物的安排上,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并无直接的连续性。《三四郎》描写一个地方出身的大学生小川三四郎初到东京后在大都市的新鲜生活、同师友的交往,以及从初恋到失恋等等,带有“教养小说”的性质。《后来的事》写了一个从大学毕业、已达“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故事通过不同寻常的恋爱事件,展示了主人公种种复杂的精神历程。《门》描写一对违背世俗道德的中年夫妇的阴沉而平淡的生活。这三部曲,特别是《后来的事》这部作品,一反作家早期创作中那种绚烂多姿、洒脱轻妙的语言风格,代之以精雕细琢的写实手法,成功地描绘出主人公的复杂性格及微妙的心理活动。但这是就作品表现的艺术形式而言,而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则在于它所蕴含的深邃的思想及对当时日本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生动地刻划了日本帝国主义确立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一个对日本近代化采取批判者、旁观者立场的人物。主人公最初停留在所谓“思索者”、“有头脑者”这一现实社会旁观者的地位,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他终于转变成为不惜与社会为敌的“行动者”。作品的情节虽有发展,但作品只写到主人公决心与因袭的社会道德开战,便戛然而止。主人公究竟走向何方,无由得知。但从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态度等种种迹象来推测,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向现实搏斗的勇士,而只能成为一个为现实社会排挤出去的畸零者。这从后一部作品——《门》的创作内容上,可以得到证明。这固然是出于作者对当时日

本社会的悲观看法，其实也是日本近代文学总的基本倾向，是受时代局限的结果。

二

《后来的事》的故事情节，是围绕主人公长井代助的不同寻常的恋爱事件展开的。故事的开端，是从代助与已成朋友之妻的、过去彼此曾有过一段相互爱慕之情的三千代重逢开始的。同这一主线并行的另一旁线，是代助的官僚资本家的父亲正在策划为代助提亲。这两条线索随着故事的开展，构成了交错的矛盾。代助在三年前大学毕业的时期，曾与他的好友菅沼的妹妹三千代暗暗相爱，在他与她的关系即将明朗化的紧要关头，菅沼突然死去，他俩的关系也随之失去了中心支柱，三千代被接回故乡去了。当代助的另一个同窗好友平冈常次郎向代助倾吐了想娶三千代为妻时，代助出于对朋友的“侠义心”，压抑了自己内心里的真实感情，用代助后来自己反省的话来说，也就是过于轻视了自己内部的“自然”，不惜为平冈亲执媒妁之劳。在当时，代助以为自己做了一件“高尚”的事，但是三年时间的流逝，使代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发觉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火种并未熄灭，他忍受着过去他所轻视的“自然”向他复仇的痛苦。而平冈由于生活的荒废，染上放荡的习癖，并牵连到龌龊的金钱关系中去，他失业了，不得不携带三千代回东京来。当平冈重新出现在代助的面前时，代替故友重逢的喜悦，是代

助失望地看到平冈已成为生存竞争场里的一个小市民式的人物。特别使代助感到不安的是，三千代与平冈的结合并无幸福可言。平冈只是将三千代看做自己的私有物，她不但忍受着丈夫对她的冷漠，忍受着丈夫的放荡行为，而且病弱和贫困也在折磨着她。代助出于对三千代的怜惜，曾企图在物质上帮助三千代，但这并不能解除三千代精神上的凄凉与寂寞。面对这种情况，代助逐步唤起了埋藏在心底的、对三千代的隐微的感情，开始反省自己过去违背“自然”而压抑真实感情所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代助的父亲为了与地方上的大富豪攀亲，正在策划代助的婚事。就在这双重矛盾当中，代助的内心在反复动荡。是彻底忠实于“自我”，还是接受父亲为他布置下的、违背“自然”的亲事？代助的理性和逻辑思考力使他选择了前者。代助深知这样做是社会的因袭礼法所不能容的，但他决心与现实社会为敌，终于向三千代表白了自己的真情，而三千代在流出了为什么在她未嫁之前代助抛弃了她的哀怨泪水之后，毅然接受了代助的爱的誓言，决心与代助共同迎接命运的试炼……

这部作品，写的虽是爱情故事，但并无一句青年男女恋爱中常见的那种甜蜜的私语。有的只是双方直接接触及内心深处的情感交融，是饱经人世风浪的一对男女贯彻他们成熟了的信念的结果。因此，作者在写代助与三千代的关系这条主线上，与其说是作者在写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在探索“自我”确立的过程，探索日本半封建的婚姻制度与维护自我尊严的矛盾，探索世俗伦理观念的虚伪本质。按世

俗的观念来看，代助夺走了朋友的妻子，显然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正象代助经过反复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那样：由于那时自己太年轻，过于轻视“自然”，结果造成了平冈娶了不该娶的人，三千代嫁了不该嫁的人。换句话说，若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听任这种并无真实爱情可言的夫妻关系糊涂下去，才是不道德的。而世俗的常识，世俗的规范，却宁愿维护这种虚伪的夫妻关系，而决不允许代助有向世俗道德挑战的行为。另一方面，代助的父兄分明出于自私目的，企图攀亲富豪以作为他们经营的企业的靠山，但却振振有词，以关心子女亲事为名，强迫代助应允这头亲事，否则便以断绝对代助的经济供应相威胁。对此，代助的父兄既不引以为耻，而社会上的常识规范也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作者正是把这种普遍存在于当时日本社会的日常现象，集中提炼为艺术作品，提示给读者，促使人们去深思。至于作者的态度，则是十分明确的，正如书中代助向平冈讲明他与三千代的关系时所说：“按习俗，我向你这位三千代的丈夫致歉，但是我认为我的行为本身不存在什么矛盾，也没冒犯什么。”

三

这部作品，虽然通过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揭示了真诚与虚伪、“自然”与“意志”的矛盾，并尖锐地抨击了在男女爱情上、在夫妻关系上世俗伦理观念的虚伪性，但从整个作品

来看，它的批判锋芒远不止此，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日本社会近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作者在塑造代助这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时，给这个人物赋予了种种复杂的思想及性格特征。他既是个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又是个袖手旁观者；既是个在精神上不为世俗观念所囿、独立不羁、有所自恃的人，同时又是个对周围的人采取不即不离、优柔寡断的人。尽管他具有看穿对方行为动机的判断能力，但又尽量避免与人争辩、对抗。因为在他看来，与人争吵不过是“二十世纪的堕落”的现象之一，是他理智上所不屑为的。由于他受有高等教育，通晓日本及西方的情况，因此他对日本近代化社会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忧心忡忡。在他看来，日本这种急于跻身于一等强国之林、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忘却精神文明重要性的国家，正象一个虚张声势的店铺一样，门面很宽而进深极短，这种可怜的现象是出于硬要与西方列强比高下的结果。它必然会象伊索寓言中所讲的那样，是青蛙与牛竞赛，最后以鼓破肚皮而告终，而这种与西方竞争的影响，势必要波及到每个日本人身上来。其结果是，人人都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生活难”。当代助看到由于都市的急剧膨胀，都市近郊出现大批供出租的粗陋房屋时，他认为这些都是新暴发的小资本家用最低的投资来冀求最大利益的结果。他把这类房屋日益增多的现象，称之为“败亡的发展”，认为是“代表目前日本的最好象征”。同时，在代助看来，受西方资本主义巨大影响的日本民族，精神上已失去独自思

考的力量，汲汲于追求眼前事物，从而招致了精神的疲惫与道德的颓废。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是内心里互相侮辱，就不可能接触；人们必须习惯于暗地里明知对方在犯罪，而表面上却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基于这些认识，代助得出结论说：展望日本国内的任何地方，无一寸光明之土可寻。代助这种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实际也是作家本人对日本近代化的看法，这些从作家所做的讲演《现代日本之开化》以及作家在其他作品中托之于人物之口的许多关于近代化的批评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只不过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把对近代化的看法同代助这个人物性格特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得更加血肉化罢了。

作家笔下的代助，虽是个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者，但这个人物又决不是象某些日本作家在批判时自觉、不自觉地倒退到封建立场上来批判现实那样。恰恰相反，代助这个人物站在进化论的立场，认为道德是随着社会的现实而改变的。那种先在头脑中臆造出某种僵硬的道德，然后以这种道德规范反过来企图左右社会的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代助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对父亲张口不离“诚者天之道也”的说教，对父亲“为国家为社会出力”的大题目，内心里报以不信与冷笑，他背地里批评他父亲“要么是伪君子，要么是不明事理的糊涂虫”，“如果为国家为社会尽力，而能象父亲那样发大财，那么我也不妨为国家为社会尽力了”。因此，在代助看来，无论是旧的封建道德，还是从西方贩来的资产阶级道德，对受“生存欲望”所袭击的不幸的

日本国民来说,都不过是“迂阔的空谈”。这样,代助这个人物便不能不陷入精神无所凭依的境地。他将这种境地称之为“现代人的不安”、“现代人的孤独”,而代助本人也的确时时为这种不安与孤独所困扰。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明治时期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一些知识分子共有的精神特征。他们丧失了现存的一切信仰,却又望不见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时代的曙光,因此,他们一方面力图保持个人的精神自由与“自我”的尊严,另一方面又不断意识到这个社会处处在毁灭他们的“自我”,从而感到对现实无能为力。代助这个人物形象,尽管在爱情问题上从违背“自然”到承命于“自然”,在行动上进行了一次飞跃;但作为头脑清醒而行动逡巡、对客观事物丧失干预的热情而又坚守自己个性的知识分子,他的人生道路上的转变自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这种既坚强又软弱的特性,很投合生活在窒息的时代下的某些知识分子的口味,他们对代助产生共鸣也是理所当然的。

作家对于他所创造的代助这个人物,也并不是毫无批判的。在作品的开头,作家将代助刻画为一个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的快乐主义者,一个孤芳自赏的生活情趣的享受者。他自甘于“高等游民”的地位,不想从事任何职业,在他看来,在激烈生存竞争的社会里,一旦套上职业的枷锁,就要听从有形无形的雇主的命令。如果你想诚实做人,就有丢掉面包的危险;如果你死抱住面包,就必然走上堕落。因此他宁愿做一个“高等游民”,以保持个性的尊严。但他忘

记了他的这种“精神贵族”的地位乃是依赖他的父亲——官僚资本家恩赐给他的“余沥”，才勉强得以维持的。他对父亲的为人本来内心里存在着怀疑与不满，甚至看穿了父亲的伪善，但在表面上，他却采取了不即不离、虚与委蛇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当他的感情日益倾注到三千代身上时，他的理智告诉他，这必然导致断绝从父兄那里得到的生活来源，从而他几次出现恐惧的心理。这说明他的“旁观者”、“批判者”的地位，原是建筑在砂上的楼阁，一遇风暴，便不免土崩瓦解。由于作者了解代助这种知识分子的弱点与矛盾，同时也是出于作家对变革现实的悲观看法，所以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门》中，作家写了一对违抗世俗道德的中年夫妇的暗淡生活。他们虽然享受着“爱的恩宠”，但他们既被社会所抛弃，所以只能忍受着孤寂与贫困的折磨。《门》中的主人公与代助具有一脉相承的性格。他企图摆脱“现代人的孤独”，一度求助于宗教，但他的理性不允许他自我麻醉。因此他虽想从孤寂的“门”超越出来，而终于只能成为一个“伫立在门前，等待日暮的不幸的人”。《后来的事》与《门》是在主题思想上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作品，《门》的阴暗绝望的主题，正说明了象代助这样生活在明治社会中的违抗现存秩序的某些知识分子行动的界限，其实也是作家认识现实的界限。

四

夏目漱石以他的处女作《我是猫》赢得了一世文名。不久，他放弃了大学教师的职务，成了《朝日新闻》特聘的专业作家。从此，他写的小说便逐年连载在《朝日新闻》上。作家很了解在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性质，他殚思极虑，力图把小说写得引人入胜，《后来的事》这部作品在这点上取得很大成功的。这部作品结构严整，情节发展及人物刻画均有独到之处。作家不但将作家本人对日本近代化各种弊端的不满，合乎自然而不是生硬地溶化在主人公代助这个人物身上，使之血肉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主人公的思想境界；而且也细腻地刻画了作为明治末期知识分子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性格特征：既不屑与现实同流合污，又无力同现实搏斗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作者虽然最终刻画了主人公在爱情上认识到“最后的权威属于自己”，从而向新的生活迈出了一步；但同时也反复刻画了主人公内心的不断起伏变化，时而迸发激情，时而产生逡巡与恐惧的心理状态。这样，就使得代助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地浮现在读者眼前。

作家在故事情节展开的处理上，避免开门见山式的平铺直叙，而是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巧妙地反复使用了暗示与伏笔。即以代助与三千代未嫁之前两人曾经有过深厚的感情基础来说，直到第十四章，即作品已进入尾声，才以追述的形式作了正面交代。而在此之前，作者在生活细节的

描写当中，时时插入几笔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伏笔，隐约闪烁地引起读者欲知究竟的期待心理。这种手法还可以赢得足够的篇幅，使主人公得以在围绕他的环境当中充分展示他的性格。至于代助与三千代的感情急剧升华，按故事情节本身来说，已萌芽于两人重逢之始，但作品是在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处才予以点明的。细心的读者可以仔细玩味作家如何使用这种手法以适应报刊连载小说的特点。

作家在故事结构上，也是用心良苦的。作品一开始，就为读者暗示了两条交叉的矛盾：三千代的重新出现引起了代助旧时感情的复萌；父亲强行为代助议亲，暗示代助迟早必须做出抉择。这时故事的节奏是徐徐地向这两个交叉的矛盾发展的。从代助的生活细节当中，从代助复杂的内心活动当中，从代助与三千代的丈夫平冈对人生看法的分歧当中，从一些次要的陪衬人物，如为生活所俗化了的文人寺尾的几次出现当中，作者着力设色敷彩，使代助的形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跃然纸上。经过这些渲染之后，作者将故事推向结尾的几次高潮。先是代助与三千代的互爱表白；继之是代助毅然拒绝了父亲为他安排的亲事；再转为代助与平冈的会面，平冈宣布与代助绝交；最后是代助与家庭的彻底决裂。作者通过这些紧张的矛盾与冲突，充分地展示了社会与个人、个性尊严与明治时代封建伦理的重压是无法调和的这一主题思想。

作者在描绘三千代这个妇女形象时，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写得相当成功。她温婉、文静、纯洁、善良，她的丈夫平冈

走上社会后，精神日益荒废，对她日益冷漠。她嫁给平冈虽缺乏真诚的爱情基础，对于平冈生活上的放荡，她却从不流露怨言，而是自怨自艾，将自己的凄清寂寞深深埋藏在心底。当其与代助再会时，她唯一的意愿，就是希望代助能有个心爱的妻子，建立起幸福的家庭。当其与代助又重新接触，两人逐渐唤醒往日的情怀时，她又是那样深情脉脉，含而不露。当代助向她表白了内心的真实感情，忏悔自己铸成的大错时，她在拭去“为什么抛弃我”的哀怨泪水之后，继之而来的又是那样的镇静与坚定。她不象代助那样瞻前顾后而为过多的“自我意识”所苦恼，她一旦下了决心，便勇往直前，准备与代助共同迎接物质上的匮乏与世俗上的任何打击。当然，她内心过分的单纯，这使她只知追求真诚的爱情，而不及其他。这正是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过渡时期中的一代妇女的形象，不能在她身上要求过多。

夏目漱石的《后来的事》是作家全部创作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十分成功而又富于思想意义的作品。它不象作家的前期作品《我是猫》那样，虽富于强烈批判精神，但往往陷于脱离人物性格而空发议论；也不象《哥儿》那样，虽然人物性格刻画得相当生动，但整个作品却缺乏深邃的思想。他的一些后期作品，对社会的正面批判有所减弱，着重剖析人们追求私欲的心理及对人生的悲观看法。而这部中期作品的主调却是积极向上的，它通过丰满的人物形象，批判了存在于日本近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向读者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日本有的评论家称这个近代作家为“人生教师”，

这个评价当然是以这个作家的整个创作为依据而作出的。而这部作品最足以证明作家获得这一称扬，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刘振瀛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